

【理论探讨】

明代海南丘氏家族医学事迹及著作考述*

余泱川,尹明章,于挽平
(海南医学院图书馆,海口 571199)

摘要: 琼山丘氏是明代海南的名门望族。该家族入琼之初,族人多有医学事迹或医学著作见诸史志,医学传承绵延四代。本文以丘普、丘濬、丘敦为代表人物,以正史、地方志、医籍等文献中的记载为史料来源,初步考证该家族第二代丘普任职医学训科时的业绩和其在家族医学传承方面的贡献,介绍了第四代名宦丘濬所撰三部医学著作的主要内容、历史影响和版本流传情况,评述第五代太学生丘敦之遗著《医史》的体例特色及其中蕴含的医学思想和观点。

关键词: 海南;丘氏家族;丘濬;群书钞方;医学著作

中图分类号: R-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18)09-1206-03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Medical Deeds and Works of Qiu family
in Hainan in Ming DynastyYU Yang-chuan, YIN Ming-zhang, YU Wan-ping
(Library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99, China)

Abstract: The family of Qiu in Qiongzhan is a distinguished family of Hainan in Ming Dynasty.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arrival to Hainan, four generations of Qiu Family practiced medicine or wrote medical books, the records of which appear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local chronicles. This paper focused on Qiu Pu, Qiu Jun, Qiu Dun, researched their deeds and works in medicine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lated records in ancient documents.

Key words: Hainan; Qiu Family; Qiu Jun; Qun Shu Chao Fang; Medical works

明代是古代海南社会文化、学术教育发展的高峰时期。随着邢宥、丘濬、唐胄、钟芳、王弘海等一批名宦、大儒的涌现,海南逐渐由地处边陲的化外之地转变为天下闻名的“海外邹鲁”。伴随着文化的进步,海南医学亦在此时走向成熟。在海南古代方志中存有姓名的68位医学人物中有27位生于明代^[1],历代由琼籍人士撰著的9部医籍中有8部出自明代^[1]。而纵观明代的海南省医家,能以医名、医著见诸史志的首推以丘普、丘濬、丘敦为代表的丘氏家族。

1 明代海南丘氏家族医学传承概述

丘氏家族于元朝末年从福建迁入海南,其入琼第一代为丘均禄,其以“元帅府奏差”之职落籍海南琼山(今海口市琼山区)。第二代为均禄之子丘普,任临高(今海南省临高县)医学训科,为丘氏家族中首位业医者。第三代为丘普独子丘传,于33岁早逝。第四代为丘传二子:长子丘源承袭祖父之职业医,次子丘濬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宦声、文名之外亦有数部医学著作传世。第五代为丘濬六子一女:其中嫡长子丘敦有未完成的医著遗稿存世,季子丘京则有医学上的义举见诸方志。其后丘氏子孙繁盛而多业儒出仕,再无医学人物留存史志。丘氏

入琼之初,便秉持“人家仕宦不常,而生业不可废”的信条以“耕读”传家,然其数代族人因家学渊源,无论业医与否皆有医学事迹或著作传世,是海南地方医学史上绵延四代的医学家族。

2 肇始家族医学的医官丘普

2.1 丘普任医官时的业绩

丘普(1368-1436年),字思贻,任临高县医学训科。《嘉靖增城县志》记载“今之为其官者,以‘训科’为名,盖欲其聚医生而训之,使各专一科……然后官从而考之,别为数等。”^[2]可见丘普所任之职以教育和考核医生的知识、技能为责,其对医学诸科学术的掌握必在普通医生之上。关于丘普任职训科时的业绩,丘濬《可继堂记》中提到“公以临邑医官满考,赴铨曹,留京师。”^[3]所谓“满考”,是“任满考绩”之义,“铨曹”则为官员考核、选拔机构。明代内外官员自任现职起,3年为初考,6年再考,9年通考,然后行黜陟之典^[4],说明丘普在其担任医官的第一个9年中,3次考绩至少都是称职的。而明初由于太医院医生不足,故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著令“凡医生有缺,各尽世世代补外,仍行天下访取。”^[5]故丘普“留京师”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考绩优良而入太医院充任医生,此为其医学水平的旁证。丘普不仅拥有高超的医术,对地方公益亦多有贡献。《正德琼台志》记载:“(丘普)性仁爱,专以济人利物为事。宣德九年,郡中大饥,白骨遍野,普于第一水桥舍地若干亩为义冢以葬之。”^[6]义冢的设立,不仅出于对亡者的人道关怀,其于地方公共卫生也有积

*基金项目: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HNKY2016-34);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HNSK(QN)15-94)

作者简介:余泱川(1984-),男,河南郑州人,讲师,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从事岭南医学史及中医古籍文献学研究。

极意义。丘普能够贡献自家土地安葬饿殍,说明其于仁术之外兼有无私的仁心。

2.2 丘普对家族医学传承的贡献

丘氏医学能够传承四代,实赖丘普奠定基础。明代医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高,即使医学训科这类医官,在明代官吏系统中亦为“设官不给禄”的“杂职”,然而丘普并不因此偏废子孙的医学教育,而是根据资质不同合理培养。由于独子丘传多病而早逝,丘普实际承担了长孙丘源和次孙丘濬的教育之责。丘濬《可继堂记》述曰:“一日先祖(丘普)坐堂上,兄与濬偕侍。公谓兄源曰:‘尔主宗祀,承吾世业,隐而为良医,以济家乡可也。’谓濬曰:‘尔立门户,拓吾祖业,达而为良相,以济天下可也。’^[3]”而丘氏兄弟当时的反映是:“时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励自持,不敢失坠。^[3]”可见丘普深具慧眼,能够认识到尚为稚童二孙潜质上的差异,为他们选择适合的人生道路;同时也说明他注重培养后代早立志向,且时时以之鞭策自己。事实证明,丘普的教育是成功的,长孙丘源继承祖业,袭任医学训科一职;次孙丘濬终成一代名宦、硕儒,然于医学亦颇有涉猎。

3 大儒通医的名宦丘濬

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号深庵,谥文庄,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曾任国子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要职。丘濬一生以官声、文名昭彰史册,国学大师钱穆谓其“不仅为琼岛一人物,乃中国史上之一第一流人物也”^[7]。其一生著述,于经史作《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世史正纲》,于诗、文、剧本则有《琼台诗话》《琼台会稿》《五伦全备记》《投笔记》存世。此外,作为丘氏家族的第四代,丘濬对于医学亦涉猎颇深,著有《本草格式》《重刻明堂经络前后图》《群书钞方》3部医籍。

3.1 《群书钞方》

该书为丘濬医著中惟一存世者,也是目前已知存世的惟一一部由海南籍历史名人所作之医学古籍。如其自序所言:“读诸家书遇有成方,辄手钞之,积久成帙”^[8],该书乃辑汇各类书籍中所载之方剂而成。与历代方书不同的是,《群书钞方》专搜医书之外的经、史、子、集所载方剂,此为其内容上的一大特色。该书所辑之106种方剂出自36种历代文献,迄自唐初的《周礼注疏》,止于元末戴良的《九灵山房集》,涵盖经注、正史(如李延寿《北史》)、笔记(如贾似道《悦生随钞》)、志怪(如洪迈《夷坚志》)、书信(如苏轼《与徐十二书》)、诗歌(如柳宗元《种白菡萏》)多种文体。方剂之排列,以其所出书籍的成书先后为序,由唐、宋至金、元;条文的组织以所源书籍为纲,以方剂为目。每一条文按方书体例首列方剂名(如“苏合香酒”)或主治病证(如“治遍身出

汗”);次列所用药物(包括用量及炮制方法),再述方剂的制法和用法;最后附以原书的相关内容,包括原文所出章节、方剂的创制人和创制过程及对药效的记述等。

《群书钞方》成书之后,颇为海内外医界和藏书家所重视。《本草纲目》《医学入门》《续名医类案》及日本《杂病广要》都曾引用该书内容,而《百川书志》《国史经籍志》《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等多部重要书目都对该书进行了著录。惜乎刊行不广,《群书钞方》在国内的流传自清初便已断绝,流入日本后又为医家所推崇,屡经传抄。该书现仅存3个版本且均为孤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万历刊本为此书惟一存世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抄本原为江户末期幕府教育机构“昌平坂学问所”抄录、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抄本原为日本医家小岛尚质所藏,系覆抄丹波元坚抄本而成,后于清末由藏书家杨守敬购回中国。

3.2 《本草格式》

该书为丘濬所编纂的一部本草著作,其名见于《道光广州通志·艺文志》,原书已佚。丘氏文集《重编琼台会稿》中录有该书自序1篇,可大致了解其体例及内容。《本草格式》的写作初衷是作者有感于本草典籍往往抄录、删节前代之书而成,少有出于实际观察之内容,于一物往往众说纷纭,“博而寡要,泛而无实,非独无益于世,而或至亏误人也亦有之矣”^[9]。丘濬希望能够以《周礼》中草、木、虫、石、谷“五药”为目,先立一修撰本草的“格式”,以期后世“足迹遍天下”者,穷物理之学,“成一代之书以嘉惠生灵”。据此推断,此书可能为本草典籍的编写提纲。

3.3 《重刻明堂经络前后图》

该著作为两幅人体经络图,其名见于民国时期出版的《琼山县志·艺文略》,原图已不存。《重编琼台会稿》收录有丘濬自序两篇,述及作者曾获镇江府所刻《明堂铜人图》正背两幅,绘有人体全身经络、腧穴。丘濬对其爱不释手:“悬之坐隅,朝夕玩焉”,并对其进行详加考订。其后为使该图之内容更为明晰,又加入北宋·杨介所绘《存真图》的内容,命刻工重印,即“重刻明堂经络前图”和“重刻明堂经络后图”。丘濬还认为其所获《明堂铜人图》系宋代石藏氏依据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绘之经穴图的摹刻本。当代有研究^[10]认为,日本森之宫藏僧人尚觉所刻《明堂铜人图》的底本即丘濬重刻之图。

4 著史为鉴的太学生丘敦

4.1 丘敦之生平事迹

丘敦(1460-1490年),字一成,号必学斋,丘濬长子。他未能效法父亲考取功名而入仕途,仅以丘濬之宦绩受恩荫为太学生,其详细的生平事迹见于

丘濬门生蒋冕所作“太学生丘君行状”一文。根据相关记述,丘敦自幼沉默讷言,口不习辞,不似丘濬两个幼子“皆聪悟绝伦,将他日诿以书香之托”^[11]。因为未被父亲寄托厚望,丘敦10岁便从北京回到故乡海南,“留侍吴夫人家居,佐伯父训科公主宗祀”,直至24岁,故培养教育其成长实际是他业医的伯父丘源。青年时代的丘敦鲜少出入宦门,“无故足不履城市,非有事未尝涉迹公府”^[11],故能“博极群书,藻思日以逸发矣”。后丘濬两位少子夭折,丘敦进京陪侍父亲并以太学生身份参加会试,一试不第,后对科举再无兴趣,从此闭门读书,“凡礼乐兵农、天文地形、律吕星历,以至医卜算数之说,益无不研究焉……虽盛暑铄金,亦口谈手校不辍”^[11]。后丘敦染疾,因自谙医理,深恶诸医“多泥东垣、丹溪之说,而不得其妙”^[11],故而“医每进药,多疑不肯服,即服之,亦不过数剂即止,已而更一医复然”^[11],以至“疾势殆不可为”,于31岁病逝于北京。

4.2 丘敦《医史》遗稿

根据蒋冕的记述,丘敦生前酷嗜《素问》,有感于该书宏深浩博,寻常读者难于理解,故曾对朱丹溪《读素问》(现已不存)进行批注增订,其中对“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诸篇“多有发旧注所未发者”。蒋冕认为“按其法以求其书,久之若有所得。乃探其原委,审其脉络,章分而句释之。”^[11]惜乎相关内容仅数十纸,无缘复见于今。真正能够反映丘敦医学思想的是其接近完成的著作《医史》,该书系侍从整理其遗稿时发现“既(丘敦)卒,侍史出其遗稿于二巨篋中……所著书号《医史》未脱稿者四十六册”^[11],现已不存,但在“太学生丘君行状”一文中录有原书之序文、“运气表”和“三因说”3篇遗文。

根据丘敦的自序,《医史》一书并非普通的医学史著作,其写作目的在于纠正当时医家以“医者意也”为借口对古代医家学说的随意解读,为医学正本清源。丘敦提出“盖必先明于法,而后可以言意。意生于法,而亦不外于法。舍法而言意则荡,舍意而言法则拘……与其失之荡也,宁拘。”该书体例仿照纪传体史书,分为“本纪”2篇,以记黄帝、神农;“表”4篇,论述运气及《周礼》中的“五药”;“考”8篇,考证医书、职官、医器、服食、摄养之类;“列传”64篇,述及岐伯、扁鹊以降至明初诸名医。各部篇数对应“两仪”“四象”“八卦”及“六十四卦”。全书共载文78篇,丘敦认为“七与八,皆少数也。老变而少不变……然则此书其终不变而遂无用乎?”^[11]其著医史的立意中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对金元以降的医学新说多有臧否。

在“运气表”中,丘敦主张以辨证的态度认识运气学说。对于《伤寒论》中以五运六气为教条诊治疾病的做法,予以坚决的批判,认为“泥者至云某

生人于某日某经病者,治以某药,按图胶柱,其谬甚矣”^[11]。但同时他承认运气学说作为古人对气候与人体生理、发病之关系的观察和总结,对摄生、防病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可以“调其气数之偏,返其和平之化,使之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天道既顺,民气可调”^[11]。他认为当世医家之所以不能够合理地应用运气学说,根本原因在于不能领会古人“体天地,法四时,别阴阳,顺人性”的本意,只针对文献的条文,“忽其本而致详于末,舍其大而徒察其细,牵强附会,支离决裂”^[11]。

在“三因说”中,丘敦针对易水学派“古方今病不相能”的观点,提出折衷的主张。他认为李杲凭脉断症,“病之变无常,方亦与之无穷”的医学思想,可以“一洗世医按图、胶柱之固”^[11],涤荡医界的泥古之风;同时也提出随证应变、创制新方的能力,并非人人可以企及,“业医者不能皆明之(李杲字明之)”。对于寻常医生,若弃法度而兴恣睢杜撰之风,对患者有害无益。对于病因的认识,丘敦主张在陈无择的三因说之外,疾病尚有因于天、地、人之别,实则强调“因于人”,也就是社会因素与疾病的关系。他认为金元医家中张从正的“痼疾常与虐政并行”^[11],元好问的“壬辰之变(指1232年汴京为蒙古军所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死者,将百万人”,是少有的将疾病流行归因于社会变乱的论述。但丘敦仍认为上述医家虽强调了导致疾病的社会因素,却无法在医学学术之外寻找解决之道。他提倡“明君贤相其勿使人疴,其勿使人疫,死于饮食劳倦”^[11],主张为政者应使政治清明,消除产生疾病的社会根源。丘敦寄望统治阶层正世道以绝病源的思想虽有不切实际之处,但其中不乏符合当代“社会医学”思想的先见之明。

参考文献:

- [1] 余汉川. 海南医药史料整理与研究[R]. HNSK(QN) 15-94, 2017: 55-69.
- [2] 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嘉靖增城县志(第65册)[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291.
- [3] 丘濬. 丘濬集. 琼台诗文集稿(第9册)[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 4364-4365.
- [4] 王天有. 明代国家机构研究[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4: 103.
- [5] 王振国.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385.
- [6] 唐胄. 正德琼台志(下册)[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 756.
- [7] 钱穆. 明代大儒丘文庄公丛书序[N]. 中央日报, 1978-0704(11).
- [8] 丘濬. 群书钞方[M]. 江户抄本. 京都: 昌平坂学问所, 1839: 1.
- [9] 朱为潮, 李熙, 王国宪. 民国琼山县志[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4: 1182.
- [10] Museum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铜人形: 明堂图篇[M]. 大阪: 森之宫医学学园出版部, 2001: 80-81.
- [11] 蒋冕. 湘皋集[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06.

收稿日期: 2018-01-44